

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Two Periodical Economic Cris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温铁军

(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副研究员)

北京 100032)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主流经济学派都阐明过的普适性规律。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改革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周期性规律。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不仅仍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缩短,原因迥异。

1.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引发的国家资本部门垄断和地方政府原始积累

1982~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留利交税,财政对企业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和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所谓统收统支,就是任何一个单位所创造的每一分钱利润都要逐级上交财政,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由财政统一安排下达。这是全民所有制存在于财政并实施全民分配的必要条件。财税改革在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理财积极性的同时,客观上以“单位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带来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一是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占有的国家资产,来决定上交和留利,于是出现了部门之间的财产分割,也就是“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

在财政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是有绝对权力的。因为各个部门资产都是全民积累的,是农民、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从来不创造价值,是劳动的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因此,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70%以上产值来自工业,发展到改革开始时国营工业固定资产达1万个亿,是全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中央政府代表全民享有绝对的财产权力,甚至连各部门的人都认同是国家的财富。

但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于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例如石油和石化部门相比,石油工人战“三九”

斗严寒干活,凭什么收益反而比石化部门低?而石化拿的高收益,显然是国家集中全民,包括石油工人几十年的劳动剩余价值投资建立现代化企业,从而产生的资本收益;石化部门家家住高楼、看彩电,其实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又如煤炭和电力部门相比,凭什么“煤黑子”与“电老虎”就该天壤之别?其实,权利份额最差的、最无资本利润可占的是农口,因为农村把财产先分包到户了,人民公社也解体了,农口各部就成了几乎没有资产可供垄断占有的政府部门。

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每一个条块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随之就有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在决策上反映的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由自己部门起草的立法予以合法化。这就使部门利益已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徒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

二是“拨改贷”改变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性质。企业从银行贷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还贷后所形成的资产,为企业全体职工劳动剩余价值转化而成,按理应视为共同所有。现在则因产权改革滞后而已经演化成为“单位自有资产”;而政策理论上不承认拨改贷后企业资产性质上的“共有制”变化,仍从表面上片面强调“国有”,这是部门垄断资本自我保护的政策表现。

三是“财政分级承包”启动各级地方政府为自己的财政利益而进行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只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这就意味着国家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地县以下普遍工业基础薄弱,只是在财政改革后才形成了各个层次的明确的收益主体,于是,全国数千个县、市,乃至数万个乡镇便都突然有了一个要求:完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家看到,80年代中期有一个现象——“跑步进京”。就是各地方政府到北京跑中央各部门,从部门垄断占有的国家资本和收益中挖一块给自己地方;甚至拉高干子女当地方官,官场腐败应运而泛滥。随之就出现了80年代中期投资规模的空前膨胀。而又由于整个国营经济的内部分配机制是完全不能制衡的,新增投资约有一半要转化为消费基金,于是投资的膨胀又导致消费的膨胀。

由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上述问题,就出现了投资消费双膨胀,形成改革以来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2. 危机调控政策分析

1985年经济出现高潮,也导致财政出现了较高赤字。这时提出的经济调整的口号,基本上还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和上一次发生危机的1980年“八字方针”差不多。不过,1986年提出的“拍、租、转、股”,则因其触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而显然比上一次的“关、停、并、转”有本质上的进步意义;但这个进步由于仍没有进步到承认企业资产中含有职工劳动剩余价值的深度,因而得不到广大工人响应,加之种种体制环境原因,终未得以认真贯彻。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时的投资膨胀使国有企业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于是1986年开始形成所谓“乡镇企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格局”。但实际上因为外贸垄断,结果只能是“两头在外贸”。

不仅是中央控制的大中城市投资消费双膨胀,而且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创造了层层利益主体,大约8万个地方政府也都尽力争取投资,试图完成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这就在全面经济膨胀之中产生了地方差异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级政府不可遏制的“现代化攀比”。这正是中央1985年虽早已提出紧缩政策,而到1988年却仍未能见效的主要原因。从统计上看只在1986年投资略有回落,但并不构成一个周期。从现象上看是由于供给不足和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接着就出现了1988年夏季的大抢购,导致当年18.6%的物价上涨幅度。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大抢购只是80年代的特殊现象,此后则不足为训。因为我国处在开始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政策语言上刚开始讲商品经济,并不承认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也还是非市场化的。当时老百姓面对的可进入市场只有两个,就象一个跷跷板:一头是高档大件消费品;另一头是生活必需品:粮、棉、油、肉、菜、蛋。那时没股票、房地产,没有任何资本市场;也没有听说过谁买医疗、养老、财产等社会保险;当时连旅游都不是市场化的,而是大家抢出差机会。因为这些消费都是非市场化的,是国家包着的,所以对于市民而言,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和高档大件消费品两个是刚放开的市场化消费之外,没有其它消费市场来分散资金投

向。因此抢购就集中在这两极跷跷板,任何一极消费压力稍微加大,都会导致物价波动过大。

当抢购高档大件使价格上涨时,对应政策是增加高档消费税,间接大幅度提高了高档大件消费品的价格;这又客观上无异于刺激市民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无处释放的社会消费就只能转向基本生活用品,甚至抢购布、盐、粮食……。

由于两极化的消费使物价波动显得很大,所以随即引发了公众挤兑。为了防止银行存款下降,政府又较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息,同时实行保值贴补。高利吸储虽然确实使银行存款随即大增,但在贷款利率未调而且严格规模控制的政策作用下,银行当年即出现数百亿亏损,并导致财政赤字相应增加。于是,接着就必需调整贷款利息。这时,正当对地方和企业的紧缩政策于“八九”之际突然有政治条件得以实现时,又恰遇资金成本突然大幅度上涨。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终于使国民经济在1989年以后进入了萧条阶段。

对于后来者,这种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作用过程本应引以为训。

3. 萧条和复苏

1990—1991年是很典型的萧条期。企业“三角债”一度高达3000亿,库存占压达2000亿。为了安定团结,银行被迫增加贷款,用于收购企业库存,甚至给亏损企业发工资,导致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这样延宕到1991年,中央一方面继续实行紧缩方针,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只能实行“点贷解扣”。此时的农村,直接表现是农民收入连续3年下降,负担相应增加,干群矛盾激化。

到1992年,逐步适应了当时政策的各种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开始有所回升。此时“1992年小平的南方讲话”仿佛一剂猛药,突然使地方经济以大办开发区为特征猛然进入高涨,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效益并未提高,加上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投机同步作用下,再次出现1993—1994年投资与消费都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和物价都过度上涨的局面。

其中,1992—1995年每年360万亩农民土地转为非农占有的结果,约等于每年从农民手中拿走3000亿的国民收入。

4. “信用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第四次经济周期

1994—1995年,连年的高物价上涨起源于两个与80年代不同的新因素:

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必然伴随产生的“经济货币化(或称“资源资本化”)”所推动的货币超发。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90年代社会公众所面对的市场,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两极化跷跷板”了;金融资产的多元化以及投资结构的多样化,

加快了我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每一份在原来产品经济时代不用货币即可分配的资源,在90年代的市场条件下,则必然要求对应增发一份等值货币,以实现通过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和资源配置。在节省货币的信用手段和契约化的信用关系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当然会促使货币大量增发。

二是高利率造成“信用过度膨胀、企业生产停滞”的恶性循环。

有经济学家说:1994年全国贷款总规模是34 000亿;当年的官定贷款利率是在年息10%左右,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拿到贷款的利率,一般都在20%以上。这中间至少流失了10个百分点利差,折合3 400亿。若不是银行,那是谁吞掉了这3 400个亿?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解释。

据《金融时报》说,中央财政历年亏损,对银行的透支,已经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本金。财政1994年向人代会提交的报告说:今后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靠发行国债弥补。于是当年国债是1 000个亿。1995年增加到1 500个亿。1996年当再高于上年。大规模增加的国债只能高息发行,这就客观上推高了银行负债率和资金利率。

再者,银行在上一轮周期之中被迫放贷,已经有大量的不良贷款收不回来,只有用剩下的可回收贷款去牟取高利,才能偿还存款人本金和在存贷款利率倒挂的不利条件下所硬挺着支付的利息。最为极端的例子是,3年期以上的存款加保值补贴,1996年1月到期时年获利约24%,而贷款按调整后规定的利率年息约13%。存贷之间差10个百分点以上,这之中还未加上银行经营费用。

现象上看是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但这只是按照国家法定利率计算的。事实上全国大部分银行单位都坐好车,发高额奖金,盖好楼……这就客观决定了银行最起码的经济选择:官方银行既然官定不能破产,只能采取某种追求利润的行为——变相放高利贷。既然规定不能高息,那就只好发展儿子公司、孙子公司,通过搞财务公司、投资公司的违纪拆借等手段,由这些相关公司去高利放款。这就是企业到银行借不到款,而拿到的贷款都是高息的原因。

其次,银行在储贷利率倒挂条件下,存款增加就要多支付利息;还要大力吸收存款,就是因为贷款出去已经收不回来了。如果不增加存款,就没有新增贷款能力,所以一定要增加存款。这就是信用膨胀。

一般而言,在资金利率高于10%的条件下,除了投资于银行或“泡沫经济”,在实物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投资都几乎无利可图。这也是近年来“公款私存”和社会存款都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

信用膨胀的直接结果是,企业之间的连锁负债

至1995年第三季度已经突破8 000亿,库存占压约5 000亿。二者都是上一次周期的两倍半。并且,企业在负债率高达80%、资金利润率又只有约3%的情况下,亏损面必然扩大,从而导致生产停滞。

接着是恶性循环:企业不良债务导致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恶化,贷款大量地转化为坏帐、呆帐或预期贷款、不良贷款。到现在为止,金融系统承认的坏(呆)帐率大约占贷款总规模的不到30%,其他部门则说法不一。理论界最为极端的说法是高达50%以上。

5. 经济危机中的地方政府

1994年以来,60%以上的县级财政赤字;80%以上县级工业亏损。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信用状况都不断恶化的同时,有些地方政府行为也发生本质性变化。

一是变相吃存款。政府指使银行给县办工业贷款,在贷款的同时把税扣下,银行则先把利息扣下,以此满足本届政府眼前需求;包袱则甩给后人。

二是配合外商掠夺资源。在国内资金利率过高而且受规模控制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往往不顾环境污染,以有限资源置换引进外资。

三是剥夺农民地权进行原始积累。在缺乏外部资源的地方,政府只有伸出手去以地生财,大规模征占农地垄断出售。

6. 有关讨论意见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运行规律的论述,既然银行信用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支撑,那么信用恶性膨胀的下一步将导致政策支持下引入浮动汇率制,或对商业银行注入低息资金;从而通过不断扩张信用,避免金融破产及其连带的政府信用危机。我认为,对此唯一可作的早已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制度成本分析。

对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我另一篇文章“建国以来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发表在1996年第一期《发现》杂志上。文章分析了信用恶性膨胀的结果,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规律,近期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信用崩溃,直接表现为“礼崩乐坏”,即广泛的社会性“赖帐”。不仅企业、银行,各部门和地方之间也互相赖帐。一旦银行赖帐,“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信用危机就到了崩溃边缘的危险程度。对于决策而言,也就是到了不得不作取舍抉择的岔路口上:是要产业资本还是要金融资本。

企业不景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如果把现在国有企业没有积极性,经营效果不好,归因于高的负债率,那么农村也有同样问题。全国乡镇企业统算资产负债率67%。其中大型乡镇企业(经营规模最大的1 000家乡镇企业),其资产负债率为78%,接近国营企业。这反映出企业自我积累能力

光物理研究的进展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Photophysics

杨国桢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北京 100080)

章志鸣

(复旦大学, 教授 上海 200433)

一、光物理的战略地位

光物理是研究光辐射的基本性质及其与物质相互作用特性的基础学科。它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光的产生、传输, 光与原子、分子、凝聚态物质、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线性和非线性光学过程及光谱学特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 光物理的主要内容源于光学与物理其它分支学科的若干交汇点, 因而它

与光学、原子分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等学科有相当紧密的联系。近 30 年来, 光学的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光物理领域的新现象、新效应不断涌现, 光物理已成为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在未来的 21 世纪中, 光物理必将成为高技术光电子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基本学科基础。

光物理研究在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可追溯到本世纪初物理学的巨大变革。划时代的量子理论的建立就起源于人们对黑体辐射“紫外灾难”的光

过弱、资产负债率过高, 是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的普遍问题。

一般而言, 企业的债务率达到 50%, 效益受到影响(不包括流通企业; 我国流通企业相当多是全额负债的), 因为利润中有相当一块要变成银行利润; 当企业负债率达到 60% 时候, 一般产业几乎无利可图; 到 60% 以上的时候, 企业出现负利润; 而如果达到 80% 以上, 多数就该破产了。

理论界有人说, 银行应把债权转为股权, 就是把企业欠的债务转成银行对企业的股权。也就是银行从左口袋拿钱, 右口袋装钱。也有人说, 过去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是改革, 现在改回去, 把企业债务再算成财政拨款。总之, 还是在原体制内部的循环。

还有一种说法: 从管理要效益。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 就能增加效益。“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讲, 建立市场体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化, 就是先要搞产权制度改革。显然, 不能以加强管理来否定产权改革。好在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起又讲明晰产权了。只讲加强管理的说法早在 1978 年就提过, 但就是执行不下去。当不触动产权的城市改革导致企业的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时, 1986 年才认识到要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从那时起因为非经济环境变化又耽误了 10 年。现在企业负债率进一步提高,

坏帐率进一步增加, 当老路再走不下去的时候, 才终于又走回来。

与产权改革对立的另一种说法是产权改革将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从建国起两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都转化在国有企业资产中间。如果不承认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 只给他们一个劳动合同, 使他们一旦被解雇就失去生存基础, 那他们当然不是“主人”了。因而承认劳动者的产权绝不是什么“国有资产流失”, 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起因于前述的官场腐败, 设租寻租。从根本上讲, 如果不改革现行产权制度, 就不能防止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

有一派国际知名的理论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但是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是“突变式存量改革”, 就是大包干让农民分地。第二步农村改革的突破是南方率先开始搞的“股份合作制”。就是要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资产, 进一步以股份形式量化到人。不触动财产关系的改革不是改革; 建立新的财产关系, 是其它制度创新的基础。由于农村人口占中国的 74%, 因而可以说对大部分中国人是搞了动产权的存量改革的。也许渐进式增量改革只反映城市, 但那块只是“渐进”, 结果是没有增量; 而且存量越来越少, 差不多全变成负债了。再若延宕, 无异自毁。

(责任编辑 蔡德诚)